

镜像与幻象：算法中介下墨西哥流行乐中中国符号的异质化认知与传播流变

于迪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绍兴, 312000)

版权说明：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流媒体算法的全球化扩张，正为跨文化符号传播重塑着底层逻辑。在全球算法的推波助澜下，以墨西哥陷阱民谣（Corridos Tumbados）与都会音乐（Urban Music）为代表的流行文化在数字空间构建了一种独特的“赛博东方主义”景观。本文基于 2023-2025 年间 YouTube 热门音乐录影带（MV）的实证数据，运用多模态话语分析与社会符号学方法，透视了中国符号在拉美语境下的“创造性叛逆”。研究发现，经由算法中介，中国符号经历了一种去语境化的能指浮动：汉字、图腾与传统民乐被强制剥离了原有的伦理内核，并在墨西哥混血文化（Mestizaje）的认同焦虑中，被重构为财富、暴力美学与阶级跃升的亚文化资本。这种异质化认知不仅揭示了全球南方内部文化流动的非对称性，也映射出受众在真实实体与数字奇观之间的认知张力。本文据此提出打破“算法茧房”、利用亚文化模因（Meme）进行柔性纠偏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关键词：墨西哥流行乐；算法中介；异质化认知；符号资本；数字东方主义；异托邦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ss.v2i4.1693>

一、引言

（一）算法主导下的“南方”文化逆差与双向错位

在 21 世纪 20 年代，全球音乐产业经历了一场静水流深的范式转移。传统的唱片工业守门人机制被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 Spotify、YouTube 以及 TikTok 等流媒体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这些精密的代码不仅以前所未有的算力重塑了大众的听觉消费习惯，更在潜移默化中重构着跨文化的视觉认知图谱。正是在这一宏大背景下，拉丁美洲音乐市场迎来了一次惊人的爆发。特别是墨西哥，作为西语世界最大的流媒体消费引擎，不仅成为了广义拉美都会音乐（Urban Music）的核心票仓，更在本土孕育出了 Corridos Tumbados（墨西哥陷阱民谣）这一呈现狂飙突进态势的新兴流派。这种将传统墨西哥十二弦吉他、管乐与现代 Trap（陷阱说唱）的重低音鼓点粗暴揉捏在一起的跨界音乐，竟然在 Billboard 全球榜单上频频反超欧美主流流行乐。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角来看，这实质上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全球南方”

文化输出力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长期由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主导的流行审美主导格局。

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从喧嚣的流量数据移开，去审视这种流媒体传播图景下的文化内涵，就会观察到一种隐蔽而深刻的“认知褶皱”。由于中拉之间长期存在的地理阻隔、语言壁垒以及西方媒体的刻意中介，双方的底层文化认知往往陷入一种双向的刻板印象。一方面，在中文互联网的叙事框架中，关于拉丁美洲的影像常被简单粗暴地固化为“治安混乱、毒枭横行、魔幻现实”的暴力奇观；另一方面，拉美大众对当代中国的感知，也绝非建立在严谨的历史阅读之上，而是高度受制于西方主导的媒介框架以及当下的算法碎片化投喂。

笔者在长期追踪墨西哥流媒体平台时，注意到一个极其吊诡的现象：从主流天后 MV 背景中诡谲闪烁的“恭贺新禧”汉字，到地下顶流歌手频频自诩的“Chino”（中国人/中国佬）艺名，中国元素在当地青年流行文化中维持着极高的出场率。但这种高频出场却伴随着严重的文化“失语”。这些符号被彻底抽离了其原生的实体语境，犹如无根之萍，被拼接、异化并转化为一种与中国现实平行的虚幻镜像。这种双向的符号错位与彼此误认，恰构成了本研究透视全球南方内部文化流动机制的现实起点。

（二）问题提出：作为“创造性叛逆”的异质化图谱

针对上述现象，传统的跨文化传播学往往习惯于套用“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或单纯的“误读”理论来进行解释。但本研究认为，这种粗糙的定性掩盖了拉美亚文化的复杂性。当前的异质化绝非偶然的偏差或知识匮乏所致，而是一种深植于拉美本土受众心理需求与平台推荐逻辑下的“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那些原本具有深厚历史底蕴与温良伦理内涵的东方元素，在跨越太平洋进入拉美市场后，被受众和创作者进行了强制洗稿。随后，这些符号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转化为象征绝对财富、街头地下权力、或者是某种异域前卫潮流的数字奇观。

追寻这一文化异变背后的深层动因，本文试图厘清三个核心问题：其一，在流媒体算法的强力干预下，中国符号究竟是如何在视觉、听觉与文本等多个模态中被剥离原有能指，并被强行植入墨西哥流行乐叙事之中的？其二，这种将“东方符号”与“拉美街头权力/资本”深度绑定的异质化认知图谱，其背后的历史渊源与当代社会心理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其三，面对这种全球南方内部错综复杂的文化误认与符号挪用，中国在未来的跨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战略中应如何破局？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能为理解算法时代的国际传播提供一种崭新的理论解释模型，亦能为中国文化在拉美地区的精准触达与认知柔性纠偏提供极具颗粒度的实证参考。

二、理论阐释与历史维度的考察

（一）理论向度：数字东方主义与亚文化资本的暗合

剖析数字空间中的文化异变，我们的理论起点依然要回到爱德华·萨义德（Said, 1978）^[1]在《东方学》中所奠定的“他者化”批判框架。萨义德曾犀利地指出，东方几乎是被西方凭空发明出来的一种镜像，用以反衬西方的理性与优越。而这一建构逻辑在当代流媒体语境中，并没有消亡，而是隐蔽地演化成为一种更具算法特性的“数字东方主义”（Digital Orientalism）。正如安东尼·芬克（Funk, 2019）^[2]所剖析的那样，互联网犹如一台巨型“文化拆解机”，它无情地将复杂的东方文明切割为一个个缺乏历史语境、可供全球无摩擦消费的视觉碎片。在此过程中，符号必然会发生罗兰·巴特（Barthes, 1977）^[3]意义上的“能指浮动”（Floating Signifier）——汉字、龙图腾、招财猫等特定表意系统不再指向其文化母体的字典含义，而是作为一种纯粹的“视觉纹章”被受众在新的语境中重新编码。

更进一步，为了解释这些被肢解的东方符号为何会被墨西哥底层青年视作一种“酷”的象征，我们须引入萨拉·桑顿（Sarah Thornton, 1995）^[4]在皮埃尔·布迪厄基础上发展出的“亚文化资本”（Subcultural

Capital) 概念。桑顿认为,在主流社会处于边缘地位的青年群体,会通过刻意把玩一套特定的品味、黑话和视觉符号来建立自己的内部阶层与优越感。在墨西哥的 Corridos Tumbados 圈层中,主流的白人中产阶级审美被视为一种压迫。而中国符号恰恰充当了反抗这种压迫的“亚文化资本”:它既带有强烈的异域神秘感,又与欧美主流文化截然不同。因此,它顺理成章地成为拉美青年用以标榜边缘身份、构建圈层内部认同的绝佳素材。

此外,要理解这种跨界拼贴为何在墨西哥显得毫无违和感,还需借助内斯托尔·加西亚·坎克利尼(García Canclini, 1989)^[5]的“文化杂糅”(Hybrid Cultures)视野。墨西哥文化本身就是前哥伦布时期土著文明、西班牙殖民文化以及现代美式资本主义长期冲撞融合的产物。这种深厚的“混血性”(Mestizaje)历史积淀,赋予了当地创作者一种近乎本能的符号重组能力:他们天生习惯于打破文化壁垒,将外来的强势符号与本土街头叙事进行无缝嫁接。这种拼接本质上并非出于对异域文明的向往,而是基于本民族身份建构的实用性挪用。

(二) 历史的隐线:“Chino”在墨西哥的语义演变

学术界关于符号传播的研究往往容易陷入“共时性”的切片分析,而忽略了“历时性”的深度沉淀。要彻底读懂当下墨西哥流行乐对“Chino”的狂热挪用,笔者认为,必须揭开一段尘封的中墨移民史。

自16世纪“马尼拉大帆船”(Nao de China)开辟跨太平洋贸易路线以来,东方元素便开始零星渗入新西班牙总督区(今墨西哥)。但华人真正成规模进入拉美民众视野,始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契约华工潮。罗伯特·罗梅罗(Romero, 2010)^[6]的实证史学研究揭示,早期的墨西哥华人多从事铁路修筑、洗衣店与杂货铺等底层劳作。凭借着惊人的勤奋与宗族互助,华商在墨西哥北部(如索诺拉州、下加利福尼亚州)迅速积累了惊人的财富。然而,这种经济上的成功却在20世纪30年代招致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反噬,爆发了诸如“托雷翁大屠杀”(Matanza de chinos de Torreón)等惨烈的排华运动。在那段黑暗的岁月中,“Chino”一词在墨西哥主流话语中被严重污名化,成为了携带疾病、抢夺饭碗的底层“贱民”代名词。

理解了这段沉重的历史,我们再反观今天流媒体上发生的语义变异,就会感到一种巨大的历史讽刺与理论张力:曾经那个代表着受迫害、被边缘化的苦力符号“Chino”,在历经百年的蛰伏后,居然被当代墨西哥最叛逆的地下音乐创作者们重新打捞出来,并为其赋予了截然相反的含义——绝对的财富控制力与生猛的街头统治力。这种从“底层的尘埃”到“权力的图腾”的惊天翻转,正是本研究试图深度解剖的核心谜题。

(三) 现有研究的盲区与本文的破局点

反观国内学界关于中拉文化传播的现有探讨,多寄生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或经贸合作框架内,呈现出明显的宏大叙事倾向。学者孟夏韵(2019)^[7]曾指出,当前人文交流常面临“重官方传播、轻民间交往”的失衡,导致文化出海往往停留在精英阶层。赵琳(2025)^[8]的研究亦批评了学界缺乏对拉美下沉市场受众心理的田野调查。尽管杨宾(2025)^[9]、许硕(2019)^[10]开始将目光投向拉美影视剧,但针对流媒体音乐尤其是底层流行乐如何解构中国形象这一极具生命力的微观切口,缺乏实证数据支撑。

在音乐社会学领域,伊莱贾·沃尔德(Wald, 2001)^[11]针对Narcocorrido(贩毒跑马调)的开创性研究提到,该流派习惯使用体貌特征作为“绰号”(如El Güero/白人,El Chino/中国人)来构建底层英雄传奇。然而,既往研究多将此视作历史遗留的刻板印象。几乎无人察觉到,在借由短视频爆发的陷阱民谣新流派中,这一称谓正经历着上文所述的语义翻转。本研究力图填补这一横跨符号学、传播学与区域历史研究的学术空白。

三、研究设计与实证方法

为探究这种符号异质化现象背后的机制，本研究摒弃了传统的宏观文献梳理，转而采用结合计算传播学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混合研究路径。

（一）样本筛选逻辑：流量与符号的双重标定

本研究兼顾“流行度”（触达圈层广度）与“符号密度”（文化异化深度）双重指标。通过调用 YouTube Data API，笔者设定时间范围为 2023 年 1 月至 2025 年 2 月，以墨西哥地区音乐频道（YouTube Music Mexico）周榜前 100 位作品作为基础观测池。利用 Python 脚本提取标题、歌词字幕及标签中包含“Chino”、“China”、“Oriental”等关键词的音视频文件。

在前期的数据清洗阶段，笔者观察到一个极具学术价值的生态特征：中国符号并未在所有墨西哥流行乐中呈均匀散布，而是显露出一种极强的“头部聚集效应”与“圈层隔离”。这些异质化的东方符号高度凝结在诸如 Chino Pacas、Natanael Cano、Fuerza Regida 等处于金字塔尖的陷阱民谣艺人作品内，而在传统的墨西哥流浪音乐（Mariachi）或流行情歌中则鲜有涉足。这一分布规律强有力地暗示，中国符号在当前拉美流媒体中并非泛大众的审美元素，而是一种被特定黑帮亚文化圈层所垄断的“符号资本”。

经过多轮人工复核与筛查去重，本研究最终萃取出 15 个具有绝对代表性的核心样本。这些样本单支播放量均在千万至亿级之间，在拉美青年群体中具有统治级的流行文化影响力（见表 3-1）。

表 3-1：核心样本视频编码清单（部分示例）

编号	曲名	歌手	YouTube 播放量级	主要中国符号表征
01	<i>El Gordo Trae El Mando</i>	Chino Pacas	亿级	艺名、高阶层流动叙事
02	<i>Desde Esa Noche</i>	Thal í a ft. Maluma	亿级	琵琶 / 二胡采样、龙图腾、“恭贺新禧”汉字
03	<i>El Famoso Chino Ántrax</i>	Natanael Cano	千万级	歌词权力叙事、东方图腾
04	<i>Barrio Chino</i>	Pinche Mara	百万级	唐人街空间漫画重构、招财猫、竹子

（二）多模态解码与充满“噪音”的自然语言处理

在方法论的具体操作层面，研究拆分为视觉解码与文本挖掘两个维度。这并非一套完美的自动化流程，而是充满了处理跨文化“噪音”的学术博弈。

在视觉层面，引入克雷斯与凡·李文（Kress & van Leeuwen, 1996）^[12] 的“视觉语法”框架。使用多模态标注软件 ELAN 对 15 部 MV 进行逐帧的视觉解码。重点考察画面中符号的再现意义（如汉字的摆放位置、完整度）、互动意义（镜头视角、景别大小）以及构图意义（显著性与色彩饱和度）。特别是利用色彩提取工具对高频出现的涉华场景进行 RGB 光谱聚类，以量化分析其视觉基调。

在文本层面，运用网络民族志（Netnography）与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编写 Python 爬虫定向抓取样本视频下方点赞量 Top1000 的西语评论。必须承认，在处理这一环节时，研究团队遭遇了巨大的语料清洗挑战。拉美下层青年的网络发言充斥着大量的俚语（Modismos）、变体拼写以及象征黑帮文化的表情符号组合（如 🇲🇽🔪🇲🇽）。传统的西班牙语词典库在此完全失效。为此，笔者不得不手动构建了一个针对墨西哥西北部毒枭亚文化（Narco-cultura）的自定义词库，将“alucín”（幻想狂）、“bélico”（好战的、硬核的）等极其在地化的词汇纳入 NLP 分析管道。在人工剔除了近万条无效的表情符号刷屏回复后，导入 spaCy 的大语言模型进行分词与词形还原，最后利用 Gephi 软件进行词频共现网络分析，力图在庞杂的网络狂欢中，还原受众对中国符号最真实的心理投射图谱。

四、符号的“变轨”：异质化图谱的深层解构

（一）视听剥削：沦为赛博纹章的汉字与拼接的东方泛音

在运用视觉语法框架对主流流行样本进行逐帧比对时，一个残酷的符号学现象跃然屏上：中国符号正在经历严重的“背景板化”与“视听剥削”。MV 创作者丝毫没有兴趣去讲述任何一段完整的东方故事，他们极其粗暴地肢解了中华文化元素，将其异化为一种极具侵略性的视觉挂件。

以墨西哥流行天后 Thalía 与哥伦比亚巨星 Maluma 合作的亿级播放量神曲《Desde Esa Noche》为例，当镜头推向那个刻意在摄影棚内搭建的“唐人街”背景时，画面中充斥着光亮的“恭贺新禧”汉字，伴舞甚至歌手本人身上也贴满了夸张的龙图腾纹身。仔细审视便会发现，这些承载着特定民俗祝调的方块字，在这里被无情地清空了语言学与伦理学意义。对于镜头前狂欢的拉美受众而言，他们不需要知道这四个字代表着春节的祈福，汉字和龙纹身已经彻底降级成了一种带有神秘东方滤镜的几何花纹，一种用于包裹拉美都市男女荷尔蒙张力与异域风情的“视觉纹章”。

更令人玩味的是，这种视觉层面的拼贴，在听觉上同样表现出一种刻意的猎奇。在《Desde Esa Noche》等融合了 Urban 风格的作品中，创作者颇具心机地在歌曲前奏与间奏中采样了中国传统的琵琶与二胡音色。但只要音乐一进入主歌，这种轻柔的古典东方泛音，立刻被强行嫁接到了极具侵略性的雷鬼冻（Reggaeton）重低音鼓点以及墨西哥传统的 Mariachi（流浪乐队）管乐齐奏中。这种“东方民乐采样”与“拉美街头节奏”的暴力缝合，彻底暴露了创作者的功利意图：挪用中国元素并不是为了开展深度的跨文化音乐对话，传统乐器在此仅仅充当了一块能迅速撬动猎奇流量的“声学香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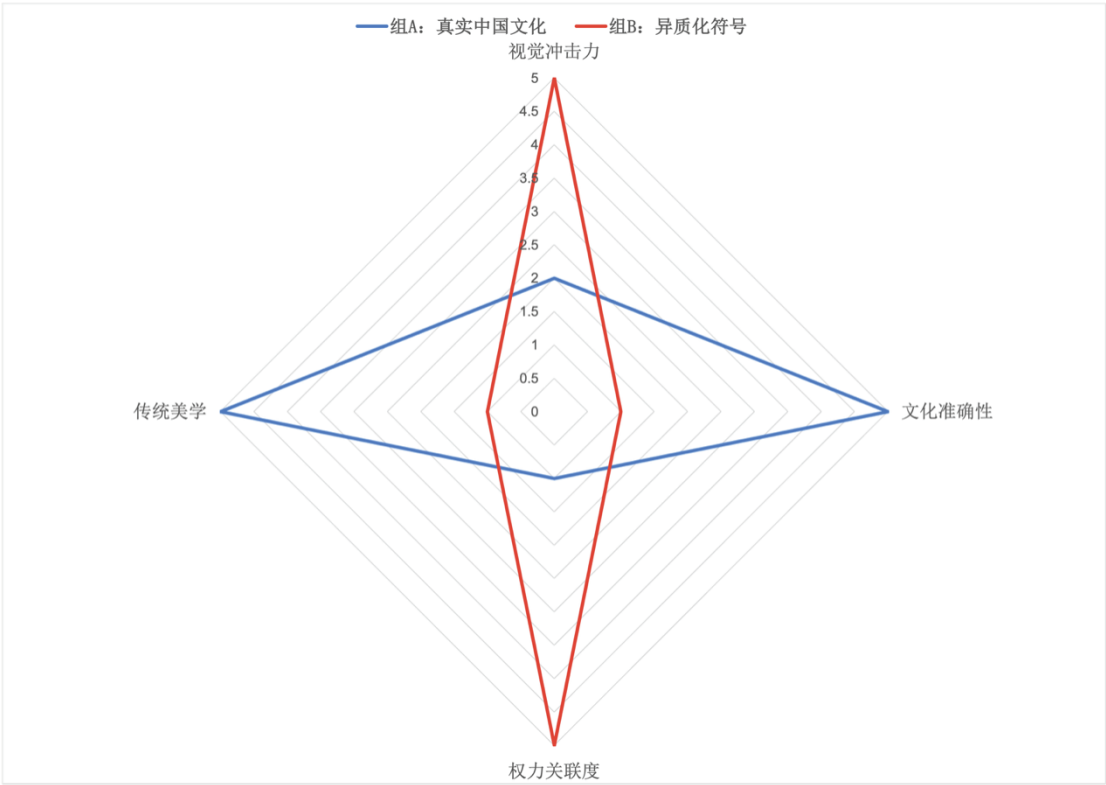


图 4-1：中国符号语义偏移雷达图

（图注说明：经过多维度交叉评测可以清晰看出，相较于代表真实文化基准的组 A，墨西哥流行乐样本组 B 在“文化准确性”与“传统美学”这两项上几乎跌入谷底，但在“视觉冲击力”与“科技感”轴线上却直线上升。这在数据层面印证了一个客观规律：在流量为王的流媒体时代，跨文化符号越是偏离其本来面目、越是荒诞不经，它在数字市场上的美学通货价值往往越高。）

此外，色彩数据的光谱聚类结果印证了这种异质化审美的分化。在如 Thalía 这样主流的 Urban Music 中，色彩尚能维持高饱和度的霓虹红；但在以地下黑帮叙事为主打的部分陷阱民谣（Corridos Tumbados）中，创作者往往完全抛弃代表温润的传统红色，转而大面积弥漫荧光绿、高饱和度电子紫等极冷色调。这套调色板实际上是从好莱坞《银翼杀手》等赛博朋克科幻电影中二手照搬过来的。通过这种西方视角的科幻滤镜，拉美创作者直接给中国形象套上了一个“非人化”、“极度内卷”与“高度工业化”的未来主义外壳。

为了将这种不可见、不可触摸的语义偏移转化为直观的数据，笔者建立了一组对照模型：将中国官方文化机构向海外发布的传统文化影像设定为“真实文化基准”（组 A），以此为锚点，对照评测此次抽样的墨西哥流行乐 MV（组 B）。邀请跨文化传播领域的编码员独立进行打分后（经预编码训练，编码员间信度 Krippendorff's $\alpha = 0.82$, >0.80 ，达到良好水平），量化雷达图结果见图 4-1。

（二）符号空心化与向底层的阶级权力置换

光是视听层面上的猎奇还不足以说明异质化的全部深度。当笔者将探针深入到陷阱民谣（Corridos Tumbados）的文本腹地时，发现这种文化置换已经彻底侵入了拉美底层叙事的骨髓。符号不仅在屏幕上失去了语言功能，更在新生代歌手狂放的吐字中完成了惊心动魄的“他者镜像”重构。

为了弄清这套底层叙事的运转逻辑，我们以表 3-1 中位列榜首的头部艺人 Chino Pacas 作为核心案例进行解剖。在他那首播放量破亿的现象级单曲《El Gordo Trae El Mando》的间奏中，有一句极具代表性的标志性念白：“Y que sigan llegando las pacas, su compa Chinito”（让成捆的钞票继续涌来吧，你们的兄弟小中国佬）。在这个极度市井化的西语语境中，“Pacas”属于底层黑话，专指成捆的百元美钞或走私货物。当歌手在亿万级流量的平台上，将“Chinito”（歌手本人的自嘲）与“Pacas”（绝对的财富象征）强行进行因果绑定时，一个巨大的语义变轨发生了：“中国”这一宏大的国家与族裔符号，被抽空了所有的历史地理内涵，强行降维成了一个与“暴富”、“捞金”、“底层逆袭”高度绑定的个人厂牌。

除了对金钱的直白渴望，这种空心化的符号还与墨西哥极度血腥的地下权力深度交织。如果结合 Natanael Cano 演绎的《El Famoso Chino Ántrax》（表 3-1 样本 03）来看，歌词中被狂热神化的“Chino”，在特定的隐秘语境中实则是向锡那罗亚贩毒集团（Cártel de Sinaloa）下属武装派别的传奇杀手兼头目——何塞·罗德里戈·阿雷奇加·甘博亚（因一头卷发被称为“El Chino Ántrax”）致敬。此人在落网前，常年在社交平台上高调炫耀其奢靡至极的游艇、跑车与镶钻手枪，俨然成了无数墨西哥贫民窟青年幻想阶级跃升的暗黑偶像。

当这两条核心线索（Chino Pacas 歌词中的成捆“钞票”与 Chino Ántrax 叙事中的“权力”）在流媒体上交汇重叠时，中华文化原本的温良伦理内核便被掏得一干二净。原本属于东方的国家符号被当做一种没有灵魂的亚文化容器，直接填满了拉美下层青年对金钱（Dinero）、权力（Poder）以及丛林法则的生猛想象。

为什么这种已被彻底掏空的异质化符号，能让上千万的拉美年轻人如此上头，甚至顶礼膜拜？坎克利尼的“文化杂糅”理论早就给出了历史的线索。墨西哥文化本来就带有一种“混血”与“拼贴”的底色，所以当地创作者对外来符号的拿来主义可以说是轻车熟路。更为核心的心理动机在于：拉美底层青年长期面对着北方邻国（美国）强势文化的压制，以及国内固化的阶层现实，他们陷入了极度的身份焦虑之中。他们心里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精神图腾来对抗“美国梦”的枯燥叙事。这个时候，恰好遇上正在全球强势崛起的中国，他们干脆就把中国当成了某种遥远而神秘的“强势他者”借拿过来，以此来武装和粉饰自己苍白的街头黑帮亚文化。这种音画联动的多模态造神运动，一旦被推上流媒体首页，很快就从

一小撮人的亚文化圈层黑话，发酵成了跨越整个西语世界的流行设定。

（三）异托邦空间的折叠：被魔改的唐人街

这种对东方符号近乎狂热的魔改，最后甚至蔓延到了对现实物理空间的重塑上。笔者尝试借用米歇尔·福柯（Foucault, 1984）^[13]的“异托邦”（Heterotopia）理论，去拆解部分 MV 中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取景地。

了解墨西哥城地理的人都知道，真实的 Barrio Chino（墨西哥城唐人街）其实规模极小，不过是位于历史中心区附近、充满浓郁市井烟火气的两三个短街区。但在 Pinche Mara 演绎的《Barrio Chino》中，创作者甚至彻底摒弃了真实的物理取景，转而采用卡通漫画的二次元形式来重构这一空间。而在这首单曲的歌词中，歌手则以极度写实的笔触，疯狂歌颂了传奇杀手“Chino Ántrax”的血腥发家史。

当如此充斥着街头求生、兄弟义气与暴力威胁的底层叙事，被硬生生地塞进一个由“招财猫”、“竹子”等高度刻板印象化的东方符号拼凑而成的二维动画空间时，原本真实的市井街区便被强制折叠了。在这些画面中，中国元素（如象征和气生财的传统招财猫）与拉美毒枭文化中的“死神崇拜”及“帮派火拼”形成了一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撕裂感。在这个被魔改的漫画迷宫中，唐人街似乎永远不受墨西哥警察管辖，它不再是华人安居乐业的生活社区，而是彻底沦为了包裹毒枭传奇的赛博庇护所与法外狂徒的虚拟异境。



图 4-2：YouTube 评论区“Chino”语义共现词云

（图注说明：NLP 词频共现分析的结果一目了然。在受众的网络狂欢中，核心词“Chino”的周围密密麻麻地被 Poder（权力）、Dinero（金钱）、Mafia（黑帮）、Fuego（火并）这类充满丛林法则与暴力美学的词汇所包围。而那些本该代表中华文化内核的词汇，如 Historia（历史）、Tradición（传统）、Paz（和平），却被无情地挤到了词云的最边缘，字号小到几乎看不见。这便是一国之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功能被彻底异化的铁证。）

五、谁在制造奇观：平台资本主义与算法的共谋

走到这一步，我们的研究必须向深处推进：到底是什么庞大机器在背后催生并加速了这种畸形的认知图谱？很明显，在“数字化生存”的当下，流媒体算法机制、受众的猎奇心理以及跨国传播的历史盲区，

在其中扮演了绝对的“共谋”角色。这其实不仅是一个美学问题，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命题。

首先，我们千万不能把 Spotify 或 YouTube 的推荐算法天真地看作是客观中立的技术通道。借用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 2016）^[14]提出的“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理论来剖析，这些科技巨头的核心商业模式就是“数据提取”与“注意力变现”。在冷酷的商业铁律下，这些底层代码的唯一 KPI 就是留存率。它们就像嗅觉极其灵敏的推荐引擎，专门挑那些高唤醒度（High Arousal）的视觉标签来放大。一旦某个混搭了“赛博汉字”、“大尺度黑帮火拼”与“强烈 Trap 节奏”的短片，因为足够刺激眼球而拿到了初始的高点击率，协同过滤算法（Collaborative Filtering）就会瞬间被激活。平台逻辑根本不关心这其中的汉字是否颠倒，也不在乎这是否冒犯了某种古老文化，它只会开始全速运转，将成千上万高度同质化的内容持续推送给目标用户（尤其是缺乏信息交叉验证能力的下层青年）的信息流中。正是在这种算法主导的填鸭式信息喂养下，原本处于边缘的“数字东方奇观”开始呈指数级裂变，最终把数以千万计的受众牢牢困死在信息茧房里，剥夺了他们接触真实中国文化的任何可能性。

另外，笔者在处理评论区海量文本时，还捕捉到了一个让人颇感无奈的历史与文化细节：东亚三国复杂的文化符号，在很多拉美下沉市场受众眼里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由于早些年韩流音乐（K-Pop）和日本赛博朋克动漫在拉美市场进行了长期且深度的商业培育，打下了“精美、赛博、潮流、前卫”的视觉基调。如今，这批伴随着日韩流行文化长大的拉美网民，在看到 MV 中的中国汉字或龙图腾时，会无意识地将那些长期积累的日韩文化滤镜直接“移情”套用在中国符号上。这种东亚文化在拉美传播内部产生的“晕轮效应”（Halo Effect），导致中拉文化传播在最源头的解码环节就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认知混淆。

六、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发现与理论贡献 综合前文在多模态、跨学科维度的深度解构，本研究可以得出以下核心发现：当下墨西哥流媒体音乐圈中这股将中国符号疯狂魔改的风潮，既是全球算法主导与平台资本主义共同制造出的一面巨大“哈哈镜”，同时也是拉美底层青年为了缓解自身深重的阶级与身份焦虑，而主动编造、集体参与的一场文化迷梦。

虽然从传统的、正统的文化输出视角来看，这种夹杂着暴力与金钱崇拜的符号挪用属于典型的名实分离，令人难以接受。但如果我们转换一下学术视角，站在文化资本流通的宏观维度来审视，这也恰恰用一种极其草根、极其生猛的方式证明了：中国文化元素在当今的“全球南方”大众场域中，早就具备了引发狂热追捧、成为顶级流行符号资本的庞大潜能。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文化误认与扭曲，如果我们的对外传播依然沿用单向灌输的传播范式，试图以自上而下的宏大叙事进行刻板宣传，估计连算法的第一道过滤网都闯不过去，更别提去打动并纠正那些戴着耳机的拉美年轻人了。因此，未来的中拉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实践，必须要学会彻底转变思路，完成一次从“单向度文化展示”向“亚文化阵地突围”的战略跳跃：

其一，放下身段，正视并转化流媒体的流行属性。既然符号已经被异化，硬性阻断是不可能的，不如顺势而为。国内的官方文化机构、出海的潮流品牌甚至是游戏大厂，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去涉足这片由年轻人主导的亚文化场域。比如，主动与那些自带庞大流量、在拉美极具号召力的 Urban 歌手开展跨界联名合作。既然当地年轻人固执地认为身上带有“Chino”元素的设定就是“酷”、就是“街头权威”，那我们就在承认并保留这个“酷”劲儿的前提下，利用官方或品牌的审美把控力，以一种平视、甚至带点潮牌特有桀骜的姿态，悄悄把真实的、精致的中国文化底蕴给有机地融入其中。

其二，启动算法逻辑下的模因（Meme）反向纠偏。既然算法天生偏爱碎片化、热衷于制造冲突感，那我们就不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熟练运用互联网模因来进行四两拨千斤的柔性纠偏。具体而言，可以由专门的MCN机构出面，积极扶持一批深谙拉美街头语境与网络文化的华裔/拉美裔双语博主。让他们专门去拍摄那种吐槽MV里“拼错汉字”、“乱穿衣服”的Reaction（反应类）爆笑视频，或者将其制作成带有幽默、自嘲性质的短视频模因在TikTok上病毒式分发。用幽默搞笑来解构刻板谬误，靠年轻人在社交网络上的自发裂变来完成文化辟谣。这种操作不仅顺应了流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在情感的触达上也绝对比板着脸说教、发声明要容易赢得受众的共情与认同。

在这个全球化格局面临剧烈洗牌与流媒体算法统御一切的今天，一国的文化在跨海出征时，遇到误读、被异化甚至是遭遇魔改，其实是在所难免的历史阵痛。作为文化输出国，我们大可不必为此痛心疾首或急于撇清关系。只要研究者与传播者能够真正俯下身子，摸透这些古老符号在数字时代被异化、被消费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并学会以一种更加灵动、更加现代的媒介身段勇敢杀入全球流量池，我们就一定在这片由代码和幻象构筑的数字奇观里，探索出一条兼顾传播效率与文化完整性的跨语境表达路径。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SAID E W. Orientalism[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43–45.
- [2] FUNK A. Digital Orientalism: Japan and the West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J]. Media Studies Journal, 2019(2): 15–28.
- [3] BARTHES R. Image, music, text[M]. London: Fontana, 1977: 32–34.
- [4] THORNTON S. Club cultures: music, media, and subcultural capital[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11–14.
- [5] GARCÍA CANCLINI N. Culturas híbridas: estrategias para entrar y salir de la modernidad[M]. México: Grijalbo, 1989: 205–208.
- [6] ROMERO R C. The Chinese in Mexico, 1882–1940[M].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10: 56–59.
- [7] 孟夏韵.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化在拉美的传播路径及其改善[J]. 江苏大学学报, 2019(06): 27–35.
- [8] 赵琳. 跨文化视域下中国文化在拉美的传播[J]. 拉丁美洲研究, 2025(5): 134–158.
- [9] 杨宾. 拉美电视剧(Telenovela): 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文化叙事与跨文化对话[J]. 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40): 48–61.
- [10] 许硕. 中国文化对拉美西语国家传播的新策略[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4): 109–116.
- [11] WALD E. Narcocorrido: a journey into the music of drugs, guns, and guerrillas[M].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1: 78–81.
- [12] KRESS G, VAN LEEUWEN T.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M]. London: Routledge, 1996: 42–45.
- [13] FOUCAULT M. 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J]. Architecture/ Mouvement/ Continuité, 1984(5): 46–49.
- [14] SRNICEK N. Platform capitalism[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35–38.